



闽 台 文 化

6

CULTURE OF FU

WUJIAN.

CULTURE OF FUJIAN & TAIWAN

闽台文化



第6期
2005年元月

晋江闽南比干庙

► 筹建会负责人精心规划
闽南比干庙的建设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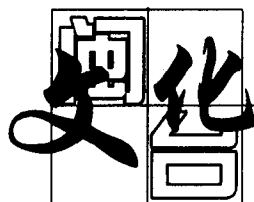


◀ 初具规模的闽南比干庙外景

► 金碧辉煌的闽南比干庙正殿神龛



2017/498/01



泉州闽台关系史博物馆
泉州民俗学会

主办

顾 问：宋兆麟 李亦园
陈国强 朱天顺
王秋桂 陈支平
林仁川 郭志超
许在全 吴捷秋
编委会主任：陈炳坤 丁家全
编委会委员：吴幼雄 李少园
陈健鹰 陈小钢
陈桂炳 陈垂成
万淳慧 黄 良
王人秋 杨清江

主 编：陈健鹰
副 主 编：陈小钢
执 行 编 辑：何振良 张 明
吴远鹏

6

目 录

越 源 汉 流

- 试论福建地区闽越族汉化的历史进程 徐心希 (1)
- 寻根——从地名释义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谢禾生 (16)
- 初论“开漳文化”的源流和影响 汤毓贤 (21)
- 略述台湾与泉州的行政历史关系 廖渊泉 (31)

文 化 图 像

- 闽南茶文化 白庭阶 石秀珠 (37)
- 试论台湾泰雅族黥面的社会文化意义 谢禾生 何仁美 (50)
- 闽台神明传说的人性化与世俗化 俞黎媛 (53)
- 漫话泉州古民居 吴鸿丽 (67)
- 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
——安溪蓝印花布的历史与未来 黄炯然 (72)

宗 教 信 仰

- 关公信仰在台湾 何绵山 (81)
- 惠安崇武城隍信仰的历史演变 石奕龙 (94)
- 试析清代城隍庙在台湾的发展 林敏慧 (105)

闽台雷海清信仰	潘荣阳 王 辉 (116)
泉州民间“土地公”信仰	李金表 (123)

民俗风情

泉州民俗与多元文化	陈凯峰 (128)
佛教与泉州民俗	李玉昆 (146)
五代泉州民俗管窥	
——读《詹敦仁诗文选》	陈桂炳 (155)
泉州南音习俗初探	林胜利 (163)
泉州南音及其习俗	吴远鹏 张 明 (172)
清代台湾孟兰会漫谈	黄跃荣 (180)
泉州主要传统节日的由来及习俗	洪荣文 (189)
泉州民俗：重文不轻商	粘良图 (196)
略谈泉港（惠北）禁忌习俗	黄炳瑜 (202)
泉州民俗丧事礼仪	张炳熙 (207)

学术视野

明清时期福建海洋社会控制的初步研究	蓝达居 (215)
简论刘铭传对基隆煤矿的经营	陈 星 (223)
2000—2003年郑成功与台湾研究述评	孙彩红 (232)

读书札记

读蒋师辙《台游日记》	徐翠红 (246)
------------------	-----------

试论福建地区闽越族汉化的历史进程

徐心希

福建地区的闽越族作为越族的一支，商周时期曾经在东南沿海活跃了若干世纪，直至汉初无诸建立闽越国。由于闽越族与封建中央政府的对立和反叛，遭到西汉朝廷的征讨与强制内迁。至东汉、三国之后，史书乏于记载。唐末五代闽国之后史书记载更属罕见。学术界有关闽越族与中央朝廷的关系，以及闽越国历史论述较多，但对闽越族的汉化课题，由于缺乏文献记述，难度较大，因而涉及较少。本文拟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试图对闽越族的汉化问题作一历史考察，并藉此了解闽越族文化与中化文化的血肉联系，以就正于方家。闽越族虽然已逝去逾千年，但是研究这个古老民族汉化的历史进程，对于深入探讨东南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联系，对于研究中国民族史和文化史，将有所裨益。由于闽越族主要居住于闽地，所以本文论及的时空范畴主要界定为先秦至汉唐、五代十国时期的福建地区。

一、闽越族的由来

闽越族是商周时期活跃于东南沿海的古老民族。虽然“闽越”一词较晚才首次出现于《史记·东越列传》，但是其形成年代当远早于西汉时期。有人以为闽和越并不是同一民族，福建在古代是七闽的分布区之一，“闽是福建的土著，越则是由会稽南来的客族。”⁽¹⁾也就是说，闽越族是由世居福建的土著闽族与公元前334年楚灭越后辗转迁徙入闽的于越族融合而成的。此为一说。第二说认为闽越族系土著说，以为闽越族“主要还是由早已居住在这一带的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²⁾我们以为第二说比较接近客观

实际情况。正如越史专家蒙文通所说：“‘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称，泛指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自越王勾践灭吴称霸之后，‘越’名大显于世。战国而后，又有‘百越’一词，泛指古东南沿海暨岭南地区及其居民。然以书缺有间，记载简略，或若明若昧。遂致后世之论越史者，见仁见智，异说纷纭。”⁽³⁾

明代学者王士性所著《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认为“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省者为是”。可见闽越族活动范围向南已抵达今潮汕一带。概括起来说，闽越族是商周时期即形成并活动于我国东南地区，即闽、浙、赣、粤四省范围内。其中以福建地区为主，自战国时起闽越族即加强与中原的联系，秦汉时期为活动高峰。先秦至秦汉之后福建地区闽越族的汉化经历了十分复杂的过程，主要可以分为华夏化及汉化两个阶段。

二、先秦时期福建地区闽越族的华夏化进程

闽越族的汉化进程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华夏化，即与中原华夏族的交往与融合；第二阶段是汉化，即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与融合，其中包括中原汉人入闽与闽越族北迁进入汉族聚居区，在政治制度、血缘关系、文化、礼制等方面深受汉族的影响。从理论上说所谓华夏化，即先秦时期的周边少数民族接受了中原华夏族的先进文化，并在礼乐制度等方面有所吸收。也就是对华夏主体文化的认同与趋同。

先秦时期尽管闽越人与中央政权并无直接的隶属关系，但交往还是十分频繁的。这可以从汉代文献的追述之中得到证明。如汉武帝时期在讨论到福建闽越族问题时，淮南王刘安就曾上书朝廷阐述闽越族的早期历史：“（闽）越，方外之地，翦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⁴⁾这说明夏商周三代之时中原人士对闽越已经有所了解，然而闽越如同胡（即匈奴）一样，不受中原王朝政令的节制。尽管闽越直至战国时仍不受中原诸侯国管辖，但闽越与内地在文化

上还是有一定来往。中原文化输入福建的孔道有二，一是以江西鄱阳湖畔为中介地区，沿赣江流域南下，经闽北浦城、光泽、崇安入闽，再经地处赣南、闽北的武夷山脉沿崇溪、富屯溪、沙溪等几条福建境内的主要河流向闽江下游及闽东南沿海扩散。二是经赣南、粤东沿汀江、赣江、九龙江向闽西南与闽南三角地带传播。以福建闽侯榕岸庄边山新石器时期3号墓葬为代表，随葬有软陶器具及玉璧一块，⁽⁵⁾玉璧为中原先民祭天之用，说明此时中原文化开始传入福建，闽越地区已有国家雏形的出现，已经步入文明的门槛。

然而闽越族的华夏化进程十分缓慢，并且首先是由接受中原的礼制开始。这可以从福建闽侯黄土仑商周遗址中所发现的具有强烈中原仿铜器色彩的陶器得以证明。黄土仑遗址位于闽侯鸿尾石佛头村南部，东南距闽侯县城甘蔗镇14公里，往北4公里即是闽江。黄土仑是一座孤立的小土丘，海拔高度约40米，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1978年发掘，几年来共发现墓葬十九座，出土或采集陶器、石器、石器等文物标本近200件。此类型遗存以灰色印纹硬陶为主要内涵，常见纹饰有拍印回纹、方格纹、刻划勾连大回纹、Z形纹、斜线三角以及附加凸棱等。上个世纪50年代即已大量发现于闽江上下游；70年代闽侯黄土仑遗址发现和发掘后才引起注意并得到重新认识。经文物普查证实，此类型广泛地分布于福建大部分地区，即福建北部、西部、中部和闽江水系流域、木兰溪流域、晋江流域以及闽东地区。省外如赣东北鹰潭一带也有发现。往北可以到达浙江进贤和江山。其覆盖面比昙石山文化及庄边山上层类型更为广大，是福建青铜器时代最主要的文化类型之一。⁽⁶⁾据黄土仑遗址出土木炭标本的C14年代测定为 3250 ± 50 年，结合陶器群的比较研究，推断其年代大约距今3500—3000年左右，即中原地区的商末周初时期。有学者认为在江西余干、修水一带已出现西周“应”、“艾”二个监国。⁽⁷⁾由此看来，华夏文化在西周时期已推进到闽赣地区了。

最引人注目的是陶鼓一件，泥布硬陶。身作腰鼓形，两端开口，中空，器身上附兽形提梁，下接喇叭形实心座。口径4、通高8.4厘米。该陶鼓出土于黄土仑遗址第17号墓。这个陶制鼓形器，与湖北崇阳县出土的商代铜鼓，在造型上颇具相似之处。⁽⁸⁾这种陶鼓，系模拟中原王朝青铜改造型，古先秦典籍中称之为“土鼓”。以下就此种土鼓的传入及用途作一讨论。

首先，这种“土鼓”的形制与内地相比，已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上个世纪70年代，在山西襄汾陶寺大墓中曾发现有“陶异形器”，为泥质褐陶或灰陶，形似长颈葫芦，筒状高颈，圆鼓腹，腹底中央凸出一孔，周围又有三个小孔，上下孔口通连，颈、腹之间两旁各有一耳，对称。有一“陶异形器”通高83.6，筒口直径11.6厘米，筒口下有圆纽十二个，筒身磨光，腹壁饰绳纹并贴泥条，构成不大规则的连续三角形和菱形图案。据《简报》作者推测这种器物或许是古文献中“以瓦为匡”的“土鼓”。⁽⁹⁾此说甚是正确。其次，土鼓的作用。《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唐尧曾“命质（或说夔）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革置（冒）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所谓“缶”，《说文·缶部》说：“缶，瓦器，所以盛酒酱，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所谓“拊石击石”之“石”，就是石磬。这种“土鼓”的颈、腹之间两旁的耳，是供穿绳子悬挂起来的鼓耳。《礼记·明堂位》记载：“土鼓、蕤桴（鼓槌）、苇龠、伊耆氏之乐也。”郑玄注：“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号也。今有姓伊耆氏者。”《礼记·郊特牲》又记载：伊耆氏始为蜡（祭）。”郑玄注：“伊耆氏，古天子号也。耆，巨夷反。或云即帝尧是也。”伊耆氏即伊祁（祈）氏。《帝王尧记》说：“尧，伊祁姓也。”“帝尧陶唐氏，伊祈姓。”土鼓、蕤桴、苇龠，是帝尧伊耆（祁、祈）氏用于蜡祭的乐器。后来周人也还沿用“土鼓”等乐器作为蜡祭之乐。《周礼·春官宗伯》说“龠章”之职“掌土鼓，豳龠”，“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杜子春注曰：“土鼓，以

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周人“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的“土鼓”，当是陶唐氏“土鼓”的继承和发展。《礼记·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县（悬）鼓。”可见三代都已把鼓作为重要礼器。《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教为鼓而辨其声用。以雷鼓鼓神祀；以灵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郑玄注：“神祀，祀天神也”；“社祭，祭地祇也”；“鬼享，享宗庙也。”《诗·小雅·青蝇》又说：“吁舞笙鼓，乐和既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礼。”《诗·小雅·甫田》：“我田既藏，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孔颖达疏：“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击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啬之神而祭之。”由此可见，土鼓是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重要的祭祀乐器，多在与农事活动有关的祭祀场合演奏。

上述论证可知，至迟在黄土仑时期，即距今3250年左右的商末周初，闽越族已开始接受中原的礼制。此外，中原古文化中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特别是对农神祭祀的礼仪与理念也已传入福建地区，并在闽越族中传承与发展。这均说明闽越族在这个时期已经逐渐走上华夏化进程。通过从中原引入祭祀农神的礼仪，表明华夏族重视农业的思想观念已深深扎根于闽越族的社会生活中，成为闽越贵族政治活动不可缺少的内容。当然，华夏化不仅体现在礼制方面，在其他物质文化方面也有所表现。如福建地区所发现的西周青铜器，更多地体现了与内地同时期青铜器的趋同性。⁽¹¹⁾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尤其是楚文化不断地输入闽越地区。在青铜器的铸造方面，闽越族体现出华夏化的倾向。如福建南安大盈所发现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和生产工具，在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又有若干中原青铜器的特点。⁽¹⁰⁾战国后期，随着楚文化向闽越地区的推进，将中原的华夏文化大量输入福建。在福建所发现的这个时期的楚人墓葬，体现了相当多的中原文化色彩。据闽侯庄边山墓地发掘者的初步研究，“这批墓葬所呈现的大至相同的葬制、葬俗等特点，反映了这些墓主

人都应当属于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一个家族集团，而在庄边山正是这一家族集团的特定的公共墓地。”“这个墓地前后至少延续了一百多年。”⁽¹²⁾ 研究者认为，这些已经汉化的楚人（也不排除其中有汉人）入闽之后，带来了丰富的中原文化与楚汉文化，对战国后期的闽越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秦汉时期闽越族的初步汉化

首先应当明确，什么是汉化？有关这方面的解释繁多。笔者认为，所谓汉化，即指某些少数民族在思想意识形态、物质文化领域以及血缘血统方面，接受了中原汉族的强烈影响；如对汉文化的广泛认同，加之人员的交流迁徙，通过通婚而改变少数民族的单一血缘关系，出现中原汉族姓氏，物质文化包括生产和生活器具、生活习俗等，逐渐接受中原汉族的先进因素。

闽越族在华夏化的基础上，至秦汉时期，开始了汉化的进程，这个汉化的过程延续时间相当长，直至五代闽国时期才基本完成。

1、闽越国除是闽越族汉化的重要转折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闽中郡，以管理东南事务。据王国维先生考证，闽中郡乃虚设，实际上福建地区并未纳入中央管辖范围，所以此时与中原内地在政治上的联系也不密切。楚汉相争时，闽越贵族无诸率众协助刘邦击败项羽，这也是闽越族对汉文化趋同的一种表现，因而无诸被汉高祖封为闽越王。无诸与中央政府之间仅有松散的朝贡关系。如李昉《太平御览》卷807载：“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灼五百支”。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击南越，汉武帝发兵救之。迫于强大的军事压力，闽越第二代王郢之弟余善与宗族谋划：“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¹³⁾ 尽管闽越族某些贵族首领企图将闽越游离于中原文化体系之外，但由于此时中原华夏族已经完成向汉族的转化，先进的经济和文化，统一的政治体制以及强大的国家实力，

均对闽越族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和融合力。闽越王族余善有鉴于此，即发动政变，谋杀了对中原政治和文化所有疑虑和敌对态度的闽越王郢，自立为东越王。希望与中央政权和平相处，以求“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这是闽越族承认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汉化的一个重要起点。建元六年（前135年）起，闽越国二王并存的特殊现象存在了23年。⁽¹⁴⁾元鼎六年（前111年）秋，余善与中央政权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遂率部队攻战白沙、武林、梅岭，刻玉玺，自称“武帝”，正式宣布叛乱。元封元年（110年）冬，汉军分四路攻入闽越腹地。力主汉化，并归附汉廷的越繇王居股与越衍侯吴阳诛余善，归降汉廷。当年闽越国除。由于扫除了汉化过程中的政治障碍，闽越族的汉化进程因而加快了。鉴于闽越贵族多次与中央朝廷对抗，因而撤消闽中郡，而将属地划入会稽郡。虽然汉军并未在闽越故地驻扎，但闽越与汉廷已建立“藩臣”关系。政治上的隶属原则已经确定。

2、大量闽越人迁徙内地与大量汉人入闽造成汉越杂居，有利于两族人民在人文和血缘方面的融合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徐广“集解”说：“年表云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平定闽越之乱后，汉武帝以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两次大的迁徙，目的地均为江淮一带。据学者考证，“处江淮间”就是在九江郡东城县及临淮郡开陵县地，并有一部分闽越人徙于济南郡和会稽郡无锡县一带。⁽¹⁵⁾这是封建政府以强制手段所实行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包括东瓯国在内的大量闽越人口进入江淮地区，与当地汉民和睦相处。以后史书对这部分北迁的闽越人再无追述，可见很快就被汉人同化了。与此同时，也有大量汉人进入闽北地区以开发当地经济。从崇安（今武夷山市）汉城所发现的陶器文字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该遗址出土大量的板、筒瓦上戳印或拍印的瓦文中，可辨认出许多汉文，而且其中主要是工匠的

姓氏，这是沿袭了中原工匠“物勒工铭”的传统。如胡、林、马、经、赞、居、里、会、真、邓、莫、赖、周、徐、良、从、黄等，当是中原入闽的工匠姓氏，而夫唐、日利、气结、胥须、以及狼、气等，则相当可能是闽越族工匠的姓氏。⁽¹⁶⁾从这些中原姓氏来看，内地向闽越地区迁徙的人口逐渐增多。作为单身男性入闽的劳动力或身怀技术的工匠，就可能与闽越土著妇女组成家庭以繁衍后代，形成汉越混血的局面。那些携家带口入闽的中原人士与闽越人的杂居，也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增多，诸如《史记·严助传》中所记录的闽越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其信息当来自于在闽越地居住的汉人之口。象淮南王刘安就说：“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这些均说明交往有所深入，加深了相互了解。

3、大量使用中原汉族的铁制工具、陶器及瓦当等建筑材料，有利于接受中原物质文化

从崇安汉城出土的所有铁器来看，均具有中原秦汉特征。据统计，汉城遗址出土的铁器达三四百件，与广州西汉前期南越国有关墓葬遗址出土的铁器总数相类似。而且铁器的种类繁多，有农具、兵器、生活及日常用具三十多种。一些先进的农具如犁铧、五齿耙等，不但在南方各地未曾发现，甚至在中原地区也尚未大量推广使用。又如瓦当、筒瓦等具有鲜明中原风格的建筑材料大量使用。应当指出的是，在崇安汉城的建筑装饰材料、封泥、陶器等器物中汉字已较多地出现。整个崇安汉城的王宫布局也充分表现了中原汉文化传统的建筑特征，即强调中轴线和左右对称，四周封闭的四合院式建筑。

4、使用铜鼎、铜铎、车马器等中原汉式器具，有利于吸收中原礼乐文化。

铜铎是1985年在汉城北岗遗址发现的，甬残缺，舞面为蟠虬纹，体侧上部饰云雷纹。勾连云雷纹及三角形的变体蛙头纹等组

合纹饰。这种文饰在山彪镇与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铜器上习见。⁽¹⁷⁾铜鼎系发现于高湖坪甲组建筑群遗址中。素面无纹，是典型的越式鼎，流行于东周至西汉前期，西汉中期后绝迹。江西、广西、广东均有发现。足见此时闽越族已基本接受了来自中原的青铜文化，说明汉代闽越国时期是闽越族汉化的初步然而也是重要的阶段。

四、三国、两晋时期闽越族进一步汉化

三国时福建属吴国会稽郡南部都尉，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一“地理”记载“建安初，始有侯官（自注：即今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八府之地）。”因闽越贵族和部分平民迁入内地与汉人融合，遁入山林的平民就被汉人称为山越。如《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曰：“山越本亦越人，依山阻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可见最初闽越后裔山越由于重入山林，汉化程度有所减弱。山越反对孙吴政权，因而遭到孙权的镇压。建安元年（196年）孙权派侯官长贺齐将以张雅、詹疆为首的山越叛民逐渐讨平。建安八年（203年）闽北建安、汉兴、南平三县的山越又叛乱，贺齐在建安建立都尉府，准备镇压。“贼洪明、洪进、苑御、吴宪、华当等五人，率各万户连屯汉兴，吴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邹临六千户别屯盖竹”，⁽¹⁸⁾均被贺齐收编。此后统治者将大批山越居民从山区强迁入平原汉族聚居区，“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¹⁹⁾。也就是将山越民与汉民杂居，成为编户齐民以进行管理。这就使山越与汉人的交往更加密切，也加速了越汉融合和山越族的汉化。首先是迁入平地的这一部分山越逐渐摆脱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接受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并且在生活习惯上也开始逐渐朝汉人方向转化。山越人从浙南、闽北、闽东逐渐散居到福建各地，此后史书未见有山越的记载。

此时汉人入闽渐增。三国时入闽的内地汉人主要有三种人。一是驻闽军人。如嘉庆《惠安县志》卷30《寓贤传·黄兴》载：“黄兴，吴孙权将也。与妻曹氏弃官入闽，居邑南之凤山”。《宋

书·州郡志》载吴将徐绍降魏后其家属被派驻建安郡。二是流谪罪犯及其家属。如嘉庆《郡武府志·古迹》云：“孙策建检其江左时，邻郡逃亡，或为公私苛乱者，悉投于此，因是有长乐、将检二村之名。”《三国志·吴书·孙亮全夫人传》载孙琳废吴主亮为会稽王。吴景帝（孙休）永安三年，“黜亮为候官侯。遣之国，遂自杀。夫人全氏随之国，居候官。”裴松之注引“吴语”：“居候官，吴平乃归。”可见内地汉人已将福建作为罢黜官僚及其家属的居留地。三是避乱入闽者。如惠安锦田黄氏族谱记载，始祖隍公，为东汉末会稽市令，于建安年间避乱入闽。西晋期间，是汉人大量入闽的高峰期。由于北方的战乱，促使众多汉民辗转入闽。“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时，如闽者八族”⁽²⁰⁾。明代黄凤翥在《金墩黄氏族谱序》中说：“晋永嘉中，中州板荡，衣冠入闽，而我黄迁自光州之固始，居于候官。”⁽²¹⁾晋江《吴氏族谱》称“中原衣冠之族自东晋五胡之乱，多避地入闽，晋江所由名也。”⁽²²⁾据乾隆《福州府志》引宋人路振《九国志》：“晋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实际上，汉人入闽并非始于永嘉二年，如1973年在闽北松溪渭田发现一座西晋古墓，其下葬年代即永兴二年（306年）。⁽²³⁾在莆田也发现有西晋太康年间墓砖出土。而且当时汉人入闽也并非仅仅八姓，民国《建瓯县志·礼俗志》即云：“晋永嘉末，中原丧乱，士大夫多携家避难入闽。建为闽上游，大率流寓者居多。时危京刺建州，亦率其乡族来避兵，遂以占籍。”入闽者也并非文献所说，均是望族。福建近年出土的晋代墓葬，相当部分是地位低下的贫民，因为随葬品极少，甚至连纪年砖铭也没有。但还是可以看到山越的活动。东晋末年，由于司马氏政权的横征暴敛，激起孙恩、卢循起义。参加起义的山越人在起义失败之后，还散居在福建沿海一带。据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风俗”记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

末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海山，至今种类尚繁。”所谓“游艇子”，也就是闽越人后裔。这些人闽汉民带来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晋安郡太守严高应用汉人的水利技术开凿东西湖，使福州地区的水害大为减轻。入闽汉人尤其是主要分布在福建漳州至广东潮州一带的汉族南方民系，对于改造闽越族的落后面貌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人通称为“福佬”。闽越、山越的后裔受“福佬”的汉化影响十分突出。东晋政府也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设立晋安郡，采取各项措施以促进这些越人后裔的进一步汉化。《宋书·州郡志》追记了闽越灭国徙民的这一段历史：“建安太守，本闽越，奉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徙其民江淮之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该书并未记述刘宋时期福建闽越族的活动，可见此时闽越已经式微。

五、唐、五代十国闽国时期闽越族的最终汉化

唐初高宗总章二年（699年）朝廷命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征剿泉州、漳州一带的畬族，进入福建的有3000多将兵58姓氏。^{〔24〕}陈元光“率众辟地置屯，招徕流亡，营农积粟，通商惠土”^{〔25〕}。这个时期福建的畬族也接触到许多来自中原的汉族文化因素，但由于畬族长期受山区地理因素的限制，所以保持了自己所固有的民族特征。住居平地的闽越、山越后裔，则不断受到来自中原的汉文化的强烈熏陶。唐末五代时，王潮、王审知率中原3万多汉族官兵入闽，“随之者又有三十六姓”^{〔26〕}。这些单身男性留闽后就要娶闽越族后裔或畬族等女子为妻。闽越族从血缘上汉化的程度比之两晋以及陈元光入闽阶段应当说深刻了许多。越汉通婚已成为寻常之事。这个阶段是如此的重要，以至在清末民初的史籍中还能看到福建人士对汉越通婚事件的追记。如陈衍著民国《福建通志》“方言”一章就说：“男子曰唐朴人（《葭村草堂集》：中州人随王氏入闽，故福州呼男子云云，案此说不确，晋时已入闽也）。女呼诸娘（案当谓无诸国之娘）”^{〔27〕}。也有说“唐铺”是唐